

宋辽金元卷

陆建芳 主编



张宏明 吴沫  
于宝东 张彤 著

# 中国 玉器 通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中国玉器通史

陆建芳 〇 主编

---

宋辽金元卷

---

张宏明 吴沫  
于宝东 张彤 〇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玉器通史. 宋辽金元卷 / 陆建芳主编; 张宏明等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7-0854-9

I. ①中… II. ①陆… ②张… III. ①古玉器—文化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0423号

**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

ZHONGGUO YUQI TONGSHI · SONG LIAO JIN YUAN JUAN

总 策 划 尹昌龙  
出 品 人 陈新亮  
出版策划 于志斌  
项目负责人  
责任编辑 梁 萍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南京书衣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83461000)  
印 刷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7.5  
字 数 920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定 价 390.00元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中国玉器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陆建芳

副 主 编 曾卫胜 孔富安 张宏明 刘云辉

张 尉 李银德 方向明 周晓晶

喻燕姣 吉琨璋 欧阳摩壹

编委会委员 于 明 于志斌 于宝东 孔富安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 刚 方向明 王志高 古 方

左 骏 刘云辉 吉琨璋 吴 沫

张 彤 张 尉 张宏明 李银德

陆建芳 陈桂祥 周晓晶 欧阳摩壹

喻燕姣 曾卫胜 韩建武

# 总序

2006年，陕西发掘出著作《考古图》及《考古图释文》的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之墓，被盗墓中还有墓主收藏的汉代玉璧等文物。此事说明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至迟应始于宋代。不过，由吕大临至清代吴大澂是以金石学的方法进行古玉研究的，他们缺乏层位依据，因而他们的古玉研究只能以文献为主要依据，所得结论常有谬误，亦无法以实物进行核证。

20世纪30年代，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前辈将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sup>[1]</sup>，国学基础深厚的李济、郭宝钧、夏鼐、郑德坤等先生均做过古玉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学术研究缺少沟通，因而并未形成大气候。而且，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是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顺序来反映其重要性。玉器类文物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能列入“其他”类别。我们阅读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掘报告，难以找到一张古玉的彩照，古玉的线图多不具备。考古界普遍忽视玉器的研究。直到1986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和余杭反山墓地业已出土了数以千计令世人震惊的精美玉器，以研究陶器为主流方向的考古界某些权威仍然不为所动，仍对研究玉器颇有微词，并视之为不务正业。

【1】程旭主编：《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三秦出版社，西安，2007年。

20世纪后20年，国家兴起的城乡建设热潮使抢救性发掘成为中国考古的最大任务，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各类古玉层出不穷。大量古玉的出土，直接导致了古玉研究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迫使考古界正视玉器这类遗存在古代历史中的价值和地位。考古界素来擅长以陶器类遗存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问题，但并不擅长研究玉器这类意识形态的产品。换言之，考古界擅长物质文化的研究，却拙于精神文化的研究。古玉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这一倾向。

第二，按照牟永抗先生所言：“以玉件在墓内方位分布为基础的……（玉器）组合复原研究，为古玉社会功能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sup>【1】</sup>一些流传于世的散件玉器，其功能性质得以澄清，文化归属也得以确认。原有的古玉研究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古玉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1992年，杨伯达先生为主编，综合了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诸方面人才，合力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玉器全集》第一次向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古玉研究资料 and 比较合理的古代玉器发展分期。在此之前，牟永抗、吴汝祚在1990年张家港召开的“东南地区古代文化研讨会”上依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出玉器，第一次提出了“玉器时代”的观点，认为史前“玉器时代”的存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

第三，一批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因为“遭遇大量古玉出土”而对古玉产生兴趣，从而走上研究道路，成为当前古玉研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史学、地质学、文化学、工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古玉研究队伍。社会上形成了古玉研究的热潮，风行古玉收藏。

2000年是中国古玉研究的重要分水岭。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直接参与并规划了古玉研究，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考古界轻视玉器研究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人有爱玉尊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自8000年前至今始终没有中断。爱玉尊玉的历史后面应该有

【1】牟永抗：《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杭州，1997年，第11页。

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弄清楚玉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sup>【1】</sup>。

在费孝通的倡议下，中国考古界以“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为主题，自2001年起连续在辽宁沈阳、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等地召开了学术会议，以古代玉器为切入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考古界开始真正地从偏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变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中来。这种改变既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也整体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以目前所见资料看，笔者初步认为，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

#### 第一阶段：美玉阶段（约8000年前至约5500年前）

相信在初始阶段，古人并未把玉石完全分开，玉只是石中之美者。美石为玉是长时间存在的一种观念。这个阶段的玉器有两个特点：一、凡异于一般石材的美石均被当成玉来对待。软玉、蛇纹石、蜡石、燧石、绿松石、煤精等在此阶段均大量可见，可称这个阶段的玉为杂玉。二、玉器均为小件，品种单纯，有管、珠、玦、璜、坠，晚段出现玉珩类特殊器形。但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玉器以人身装饰件为主。值得强调的是，史前太平洋西岸地区玉器雕琢的两种标志性技术——管钻和线切割，均已在此阶段出现。

#### 第二阶段：礼玉阶段（约5500年前至商末）

这个阶段的玉材已被神化，被做成卜筮、祭祀、陪葬的礼器。和美玉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古人对于软玉，亦即闪石类玉材，已有了明晰的辨别能力。无论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所见用材已大多是透闪石类的软玉。与之相对应，随着玉雕技艺的提高和抽象思

【1】见费孝通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2002年。



维、造型能力的拓展，这一时期的玉器出现了大型化、系列化的趋势。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文化的玉琮均已超过了30厘米高，个别器物则超过了50厘米。红山文化出现了玉璧、斜筒形玉器、勾连纹玉佩、玉镯、玉握等系列玉器。良渚文化则形成了有玉琮、玉璧、玉钺的礼玉系统。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这一时期都是我国史前玉器的一个高峰，它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以及影响力也是空前的。

### 第三阶段：德玉阶段（商末至西汉初）

这个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玉文化核心内涵的形成阶段。由于青铜器大量出现，玉礼器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铜礼器。虽然到战国时期，玉礼器仍很繁荣和发达，但西周时期形成、春秋时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赋予了玉器“德”的内涵，此点尤为重要。自此以后，“君子”和“玉德”成为互相关联的两大内容。追求玉的洁白无瑕、致密温润，即“首德次符”成为爱玉首选。如此遂使和田玉逐渐成为宫廷用玉。

### 第四阶段：吉玉阶段（西汉初期至魏晋南北朝）

这个阶段的方术文化一度普遍流行，在此背景下，西汉不只出现统治者深信可保尸体不腐的玉衣，还出现了一批辟邪趋吉的器物，典型的有刚卯、严卯，司南佩，翁仲，四灵压胜等。从此，玉具有辟邪保吉的功能成为民众共识。

### 第五阶段：民玉阶段（隋唐至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玉器从之前只有世家大族或官员才可以使用佩戴的专用物品，逐渐走向民间，成为有钱即可以拥有、买卖的物品。二、玉器的功能逐渐生活化、世俗化。

### 第六阶段：福玉阶段（明清时期）

自宋代以后，玉器的功能走向世俗化。到明清时期，玉器的设计和造型主题基本上可以用“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来总结，有“连升三戟”、

“平安无事”、“瓜瓞绵绵”、“多子多福”、“马上封侯”、“五福献寿”等，祈福、祝福的主题成为主流并流传到今天。

以上六个阶段依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也都具备各自的重要性，但真正使中国玉文化历久不衰，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的，还是德玉阶段，这均和士大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相关。

士的萌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开始，《史记》的记载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sup>[1]</sup>西周时期，士的阶层逐渐形成。至春秋时期，由于各国争霸，士这个阶层首次有了亮相的机会，于是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形成。由此可见，士的阶层首先是以思想者的形象面世的。对春秋以降的历史，我们可以把隋唐时期作为分界线，把士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隋唐之前，士主要是作为幕僚发挥作用；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产生，文官阶层逐渐形成，士的作用通过文官阶层来发挥。综合士大夫阶层产生的历史，他们的作用似乎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 一、历代政府管理的人才库。
- 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者。
- 三、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
- 四、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引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之初就十分注重自身道德和修养的修炼，充分体现在古代典籍中关于“君子”精神的论述中。

在先秦古籍中，《论语》、《孟子》、《诗经》、《春秋左氏传》、《周易》，都有关于“君子”的大量论述。士大夫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孔子率先系统地论述了“君子”的人格和修养要求。孔子认为君子的核心是道德，道德体现在“仁”上。而所谓“仁”，第一是正确处理家庭血缘关系，孝敬长

[1] 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111页。

辈，抚育晚辈。第二是爱人，并推己及人。第三则是“克己复礼”，保持内心的分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人际交往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和而不同”。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物质生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在言行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修养途径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在精神风貌上，《论语》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总之，孔子认为“君子怀德”，有德是一个君子最重要的表现。<sup>[1]</sup>

《孟子》则认为做君子是人的天性，君子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浩然正气”。君子精神从过去对君王的要求，逐渐成为对士大夫阶层整体人格和精神的要求。这种要求从萌芽到完善，再到形成体系，延续了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不但详细论述了君子之德的种种内容，而且明确地把君子之德和玉德相提并论。

亦即：

仁：温润而泽

知：缜密以栗

义：廉而不刿

礼：垂之如坠

乐：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

忠：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信：孚尹旁达

天：气如长虹

地：精神见于山川

德：圭璋特达

道：天下莫不贵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由此，钟情于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本能爱好。尊玉爱玉不但不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反而是修身养性的操守。士大夫阶层历来是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

[1] 杨天石：《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江苏文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引领者。上到帝王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爱好玉石。可以说，玉文化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士大夫文化，而士大夫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密不可分。在中国，离开了士大夫文化就无从谈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也无法真正弄清楚玉文化。玉文化不过是“君子之德，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文化核心的物化反映而已。也许，弄清这一点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倡议的真正初衷。

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想法始于2005年。这一年我筹备了中国玉器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即江阴会议。参会者有130多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提交了70多篇论文。江阴会议给我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在人才队伍建设、文献考证梳理、考古资料发布与研究三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应该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工作了。但撰著一部有关中国玉器的通史，非同小可，做这项工作与编纂玉器图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由于这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工作，不但难度大，失败的可能也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也可能吃力不讨好。我又想：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做，也许今后会有人建设中国玉器史的高楼大厦，而在目前若能搭建一间茅草屋也是有意义的。联想到费孝通以九二高龄仍然不辞辛劳地为玉文化的研究奔走呐喊，更觉得自己为之做些工作是责无旁贷的。2007年秋，我和曾卫胜、张宏明、孔富安四人在南京共同商议了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具体想法步骤。同年冬天，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方向明、孔富安、王昱东、喻燕姣、吉琨璋、李银德、王志高、左骏、刘云辉、张宏明、张尉、周晓晶、曾卫胜。会议做了各卷的分工并提出花一年到三年时间完成，各卷争取做到三个“一网打尽”：考古资料一网打尽；相关文献一网打尽；研究动态资料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写作。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先是有个别作者因工作繁忙退出，方刚和欧阳摩壹两位同志遂参加本套书的撰著。后来则是孔富安同志突发脑溢血不能再从事《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北方卷》的写作。关键时

刻，方向明和周晓晶两位不计辛劳，无怨无悔地接过他的工作，并妥善地将其完成。《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张宏明同志患脑梗，他是在恢复期中坚持把其文稿完成的。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玉器通史》即将问世，作为主编，我应该将本书的不足之处坦率地告诉大家：就一部通史来说，七年的时间其实是很仓促的。而且，由于各卷作者工作的繁忙程度不同，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各卷的质量是有一些差别的。另外，由于编委会希望各卷尽量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在体例上并没有做太多的硬性规定，因此读者在阅读本套书时难免会觉得同中有异。尤其要说明的是，春秋时代的相关内容在《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有反映，但非常单薄，这个不足只能在本套书修订时再弥补了。

回眸七年，时光荏苒，在此，我要感谢作者团队的友爱和团结。这些年，我们为写作这套书不断讨论和商榷，从编写体例到材料取舍，观点的交流和争论使我们亲如家人，每逢有困难，总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无怨无悔。

我也感谢昆山台商会的陈桂祥先生，他是我多年的好友。2007年此书启动时，他主动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笔资金，使项目得以顺利开展。我更要感谢杨伯达、卢兆荫、云希正、李学勤、牟永抗、杨震华等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在你们的指导下，我们才走上了研玉之路。

最后，衷心感谢海天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编辑，感谢你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你们为这套书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和心血，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

玉文化是物化的士大夫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当今之世，传统文化正在回归，蕴含“君子之德，中庸之道”的玉文化一定会在今后得到弘扬和光大。

陆建芳  
2014年7月

关于宋代玉器文化与玉器的鉴定研究，目前很系统的论述尚不多见。把宋代玉器这种既含蕴着相当多历史与文化信息，又有具体形制的手工制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认识、探讨并加以论述，是国内学术界近20年才出现的一种新的进展，主要以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先生的几篇学术论文为代表。另外，在国内出版的一些关于古玉鉴定与介绍的书中也有所涉及。

1. 杨伯达的《古老的中国玉文化》一文，把中国玉器划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宋代属于第五个阶段，“隋唐五代宋辽金玉文化的新倾向……外来趣味、世庶化、艺术化”，他认为“五代、宋辽、金玉文化再也见不到隋唐那样的外来趣味，它去除了隋唐的外来文化因素，继承和发展了隋唐玉文化的世庶化、艺术化的特色”。

“宋代朝廷用玉不减前朝，冠服、车舆、祭祀、礼仪以及衣食行乐均大量地使用玉器……民间设有琢玉作坊，称为‘碾玉作’，内廷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下界和修内司玉作所均是碾琢内廷玉器的衙门或作坊。至此，古玉既是文玩又是商品，在市场流通”。

杨伯达先生在其《宋元明清四朝玉器文化面面观》一文中认为：“此期玉文化确有自己的时代特点。首先，它依然扮演着帝王玉的重要角色，并演变为以玩赏、燕饮的生活用玉为主的帝王玉。其二，士庶用玉有了空前发展。其三，此期的动物

肖生、花卉及器物上的装饰图案都显示了浓郁的绘画趣味或感人的情节。第四，绘画性特点与多层次架构、三远式布景及变幻莫测的镂空技法联系在一起……并具有浓重的立雕风格。第五，其艺术手法包括了形神兼备的现实主义和古色古香的拟古主义。第六，仿古玉、伪古玉的出现丰富了玉器文化宝库。第七，玉器有着醇厚的艺术性和欣赏性。第八，清代收藏家迷醉沁色，将玉器文化引入歧途。”<sup>【1】</sup>

杨伯达的《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文，把中国玉器艺术划分为古拙的、象征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拟古主义的四个时期，宋辽、金元时期属于第三个时期的第3个阶段。在现实主义的中古时期玉器艺术中，该文进一步详细论述宋代玉器的艺术风格和达到的成就：“（宋代）农业、手工业生产发达，城市繁荣、商业兴旺，为现实主义玉器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皇家画院……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全面成熟，引导玉器沿绘画艺术途径发展，出现了立体的全景玉雕。……宋代玉器不仅具有平远、深远、高远三远的多层次全景构图，而且比例适当，形象生动，做工通灵，碾琢娴熟，尤其将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风格得以发扬。……笔者认为，宋玉在我国玉器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是宋辽金玉由气韵生动的唐代玉雕向形神兼备的艺术新境界的发展。”<sup>【2】</sup>

杨伯达在《隋唐—明代玉器叙略》一文中，对“宋辽金时期”（960—1279）的玉器做了白描式叙述，并把宋玉划分为八个类型：朝廷用玉、佩饰、首饰、器皿、文具、肖生、玉图画、铭刻玉器。这八个类型就其单一性来说，是可以存在的，但是从整体与个别的分类体系看，又是不完备的，或许可以说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因为这种分类没有运用统一性的划分标准，只是按照个人的见解，或器形（器皿），或功能（文具、佩饰、首饰），或引用乾隆皇帝的判断想象（图画），或某一特征（铭刻），或概括（朝廷用玉、肖生）。用这么多不同的标准划分又归于同一体系之中，显然不符合统一性原则。因此，这种划分有早期的局限性。

【1】杨伯达：《杨伯达论玉——八秩文选》，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6年。

【2】杨伯达：《杨伯达论玉——八秩文选》，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6年。

2. 上海古玉学者张明华在《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一书中,把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玉器分成八个阶段,其中第七阶段是“民族特色风格迥异的宋辽金元时代玉器”。他认为宋虽然是一个大统一的政权,但不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北方有辽、西夏和金国的相继对峙,情况十分特殊,“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文化艺术乃至玉器创作上,不可能如商、汉、唐代那样各自有基本的风格,各地出土的玉器呈现了风格迥异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这一现象恐怕除了原始社会外,是中国的阶级社会中最突出的一次”<sup>[1]</sup>。

3. 江苏古玉学者殷志强先生著《旅美华玉》一书,第七部分是“风情万种唐宋元玉器”,认为宋代玉器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宋徽宗嗜古物,对玉器偏爱有加。由于宋徽宗的倡导,宋代玉器业又得以发展,中国玉文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二是宋代地下出土古玉增多,滋长了玉器仿古之风……金石学的形成,兴起了搜集古玉的热潮。为满足社会好古需求,宋代仿古玉思潮不断涌现,仿古玉不断呈现。三是由于都市经济的发展,宋代玉器作为特殊商品,进入流通市场,促使宋代玉器向世俗化方向发展,生产了大量民众喜闻乐见的玉器以满足市场需要。玉器商品的出现,还刺激了宋代民间琢玉业的发展,当时临安(今杭州)、平江(今苏州)、金陵(今南京)、福州等地,都有发达的民间琢玉业。民间琢玉业的勃兴,又促使了玉器市场的繁荣,临安等大中城市玉器买卖兴隆。他还认为,辽金玉器是宋代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地域风格和民间特色的“春水玉”、“秋山玉”玉雕,既为宋代社会增添了玉器艺术瑰宝,又是契丹、女真民族对中华玉文化的重要贡献<sup>[2]</sup>。

4. 当代古玉鉴定大师张永昌在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书写的“总论”中指出:“这就反映出过去对宋代玉器识别能力还是缺乏很多知识的,迄至目前,问题还并未全部搞清,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攻克这一问题。宋代玉器的花鸟一类,没有唐代醇厚,因受当时工笔画风格影响,十分重视形

[1] 张明华:《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2004年。

[2] 殷志强:《旅美华玉》,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2011年。



态……伏兽一类，神形虽欠威武，但伏地小息，倒也显得温顺可驯……所以在器物上没有半点粗制滥造迹象，以上几点，就是宋代玉雕巧施技艺的特点。”

5. 台湾古玉学者邓淑蘋在《敬天格物》一书中，把隋唐至元的800年历史，称之为“玉之华”时期。该书针对最明显的变化与特质列出四个专题：一是出现大量以自然界之花叶、鸟兽、人物为主题的写实象生之作；二是呈现承接传统文化、以玉通人神、表彰道统的观念；三是流行仿古玉；四是呈现契丹、女真、蒙古等草原民族特质的玉器。

6. 河北古玉学者常素霞对宋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曾做过分析研究，她认为宋代玉器在继承了唐代写实风格的基础上出现了世俗化倾向。这一社会功能的转变，不仅为玉器的造型、图纹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形制，也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生活用玉的发展。主要特点为：

(1) 宋代玉器礼性骤减，玩味甚浓，比较善用由多种动植物纹组合在一起相互衬托的图案。

(2) 顽皮的童婴形象进入玉器艺术的创作领域，充分反映了宋代玉器对生活题材的摄取和选用的广泛性。

(3) 宋代玉器的造型及画面，既不如唐代那样娇艳，又不像明清时期那样俗丽。……造型比较秀巧，装饰手法比较简练。

(4) 镂空技术精湛娴熟，以花鸟形佩最多见。宋代镂空玉器一般分为单层和多层透雕两种。

(5) 仿古玉器的出现是宋代玉器的一大特点。在古物之型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当代玉器创作的新风格，是对传统文化某种价值的提升，同时必然渗透了时人述古怀旧的人文精神情感<sup>[1]</sup>。

7. 周南泉为《故宫玉器》中册写导言《由大变改至成熟期的宋辽金元玉器》，对宋玉成就作了概括性论述：“总的来说，宋玉是对隋唐五代的继承和发展，但在某些方面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此期的玉器制作最突出的变化是圆雕、镂雕

[1] 常素霞：《中国玉器发展史》，科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